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桃源深处一侗家』

侗族

罗康隆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D669.1
19

“桃源”深处一侗家

(侗族)

罗康隆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龙宝珍

封面设计：传智工作室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第四集）

“桃源”深处一侗家（侗族）

罗康隆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75 字数：430 千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81068—337—3 /C·40

（本集共七册）总定价：63.00 元

社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电话：（0871）5031071

E-mail: yupress@sina.com

总序

世纪民族文化之镜

高发元

大约在110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一、 社区：生存的依托	1
二、 婚姻家庭：生命的延续	21
三、 习俗：族群的认同	39
四、 教育：社会的传承	53
五、 侗戏：民族的奇葩	67

一、社区：生存的依托

我来到侗乡，不禁想起了王安石描绘的理想社会：“此来种桃经几春，米花食实枝为薪，儿孙长生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鱼郎漾舟迷远行，花间相见惊相问。”去那天，天遂人愿，暖暖的阳光映得山花烂漫水含笑，那连绵起伏绿绿葱葱的山峦，拥抱着恬静自然幽幽清清的山溪流水，清澈的溪水倒映着群山的皱影，山长水远，和谐成一幅优美的图画。诗情的山，画意的水，融合着山鸟的清脆，侗箫的婉转，不知是山缀绿了水，还是水映亮了山，不知是鸟伴谐着箫，还是箫引谐着鸟，我们仿佛置身于陶渊明描述过的“桃花源”中。

在县城，我拜会了主管民族事务的主任吴祥雄，说明来意后，吴主任推荐我去调查平坦乡阳烂村黄岩寨的杨校生一家。

黄岩寨，既然是吴主任推荐去的，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侗族村寨，“侗家的三宝”应是最基本的，起码有造型独特的侗家鼓楼，有结构精巧的风雨桥，有实用美观的吊脚楼，还有那曲径通幽的石板路，宽阔的芦笙坪，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行歌坐月的情郎情妹……

我们走进黄岩寨并没经过风雨桥，而是跨过了令人颤抖的独木桥，没有穿过侗家的寨门，没有看到高耸的鼓楼，也没有走过古色古香的青石板，更没有领略到侗寨“拦路酒”的风采……我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有点失望。

杨校生看出我心中的疑惑，微笑着侃起了黄岩寨的来历。

阳烂村，解放前属广西三江县，地处湘桂交界处，行政区划调整时，划归了湖南省。70年代，农业学大寨，为了“变远田为近田，变差田为好田”，阳烂村按田地质量远近，按人均3：5石田划分，住东阳烂村的人均3石，从阳烂村析出到边远地方建寨的人均5石。黄岩地区有300石左右，距阳烂村中心有5华里，又处于通道的大南门，村党支部发动党员、村干部迁到黄岩重建家园，耕好农田。当时，杨校生是村民兵连长，第一个报名搬到黄岩，在他的带领下有14户从阳烂本寨析出，迁到了黄岩寨。

早就听说，侗家有种习俗，建寨要先建鼓楼，作

为建寨的标志。为什么黄岩建寨没建鼓楼和风雨桥呢？杨校生解释说，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党的政策，要破“四旧”，鼓楼、风雨桥、寨门等一些民族建筑被划为“四旧”对象，不仅不能新建，就是老前辈建好的都被破坏了。二是修造鼓楼、风雨桥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当时党号召要勤俭节约，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黄岩寨的只有14户人家，是无力修建工程浩大的鼓楼和风雨桥的，能建造一幢吊脚楼就不错了。三是侗家的传统，一个家族只建一个鼓楼，搬到黄岩寨的是杨、龙两姓的14户，就无法沿袭旧俗，只是他们的住房仍保持了原有的样式

侗族风雨桥



杨家吊脚楼



——吊脚楼。

杨校生家的吊脚楼建于1972年，三层楼的木瓦结构。一楼是猪圈、牛圈、鸡舍鸭棚，厕所以及堆放农具、柴火和其他杂物。二楼内间设一米见方的火塘，是接待客人和全家的活动中心，火塘旁置三脚架，用于炊煮食物，全家大都围着火塘就餐，冬天在此休息取暖。外间为休息厅，设长凳，是全家人休息及妇女纺纱织布做针线的场所。三楼是卧室，粮仓。房屋的周围栽有10多株桃李树，还有一百多株柑桔林，1993年开始挂果。

杨校生的三个儿子都已成家，分开另过，杨校生与三儿子住在一起，妻子则跟二儿子住，大儿子独成一家。三家共17口人住在同一幢吊脚楼里，显得十分拥挤。

杨老一家虽然分成三家，因为三个儿子和两个儿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的事务仍由杨校生和妻子主持。农村实行联产承包时，杨老家分得18石水田，后又开辟

了2石，现共有一等田10石，二等田5石，三等田5石。一等田一石为200斤稻谷，二等田一石为150斤，三等田一石为100斤，一年可收入稻谷3000多斤。

1995年买谷种、复合肥、尿素、农药等花去550多元，比1994年多花近100元。杨老一家担心以后的物价如果再涨，就难以支付了。最恼火的是他今年花了近50元买的农药杀不死虫，恐怕秋收时，难以保证3000斤的产量，全家的基本口粮就无法保证。要花钱去买粮食，那就困难了。秋收后还要种些麦子、洋芋来补充食物。

杨老一家的土地也不多，有一块桐树林和一块茶树林，年产桐油不过三四十斤，产茶油也不过百来斤。在村子附近的几块菜园中，种有包谷、瓜果、豆类，这些蔬菜仅够家人食用，家里还养有三头猪，两头大的已有百余斤了，小的约有60来斤，是准备过年用的，还有15只鸭、7只鸡。

为了解决家庭经济的困难，杨老的二子三子及二儿媳、三儿媳都去广东打工了。杨老说，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儿媳们运气还好，一到广东就找到了工作，他们都在广东清远五金铸造厂，月收入500元左右，才去了四个月，就寄回了1200元，估计到年底可寄来3000元左右。大儿子杨秀天没有去广东打工，而是随同乡的一个好友到本县的杉木桥乡烧制枫香油，农忙节庆时也回家来。我去杨老家时，杨秀天也从杉木桥乡回家，并带回了一台双卡录音机和1000元现金。枫香油的销路好，前来购油的客商多，他估计到年底也可收入3000元左右。杨秀天说，家里的住房很窄，三兄弟加上父母都住在这

幢屋里，十分拥挤，赚到钱后，准备到河对面建一幢水泥砖房，他颇有信心地说，等你们下次再来时，肯定不住这吊脚楼，而是砖房了。

笔者回到怀化后，触目皆是一体化红砖平顶房，不禁对侗乡那一幢木瓦结构的精工住屋十分怀念。在那里，我似乎看到了人类回归自然的愿望，在那里，我似乎得到了某些寄托。

杨校生虽已年过六十了，但身体还很硬朗，家里

杨校生在打制银器



的20石稻田，都由他来管理，平时还要上山砍柴，农闲时节，杨校生主要打制银器，只要一开炉，寨上的、外寨的人都送铜、银上门来，请杨校生打制各式装饰品。装饰品主要有头上戴的银花冠、银簪子、银簪花、银梳、银钗等，脖子上挂的项圈、项链，手上戴的手镯、钏、戒指以及耳环等，图案有兽虫鱼花

草人物，千姿百态，栩栩如生。7月12日乡里赶场，在场上，几位妇女问杨老近来是否开炉打银器，杨老说因为几个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既要照管好几个孙子，又要管理庄稼，没有空打银器。杨老说，如果他的儿子儿媳打工回来以后，他就到乡里或县里开一个小店铺，专门打制各类铜银装饰品。

解放前，阳烂村会打制银器的不下60人，现在只有五六人健在了，且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解放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把打制银器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了，有的全套设备都毁了，真是可惜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才兴建了银器的打制。杨老打制银器的设备很简单，一个小炉子，三把不同型号的铁夹子，两把大小不同的锤子，一杆称铜银的小秤，以及装有细小东西的工具箱。

杨老12岁时跟父亲当了3~6年的学徒，父亲将打制银器的技术传给了他，18岁时自己另立门户，独立开炉了。现在他已年逾花甲，准备把打制银器的技术传给最小的儿子杨秀川，杨秀川在广州打工，无法知道他最近的想法怎样，也不知道秀川的两位兄长又有什么想法。

杨老一家搬离阳烂本寨已有35年了，但他们的根还在阳烂，在黄岩仍有一种暂住的感觉。在他谈话中总是说：“我们阳烂寨”。很少提到“我们黄岩寨”，说到阳烂寨，杨老兴致勃勃地邀请我们去看他的故居，看他们的鼓楼、风雨桥，参观他们的戏楼、芦笙坪、满金庙、寨中古井……

阳烂寨座落在两山之间的小坝子上，一条清澈的

进入阳寨的寨门



小溪从寨边流过，四周是宽旷的田野，寨里最醒目的莫过于寨门、鼓楼了。

寨门是木瓦结构的凉亭式拱门，我们沿弯曲的田埂走进寨门时，杨老说，这寨门已有数百年历史了，寨门有很大的威力，它可以抵御外来的晦邪之气，也可以保护寨子平安，人兴畜旺，五谷丰盛，杨老家虽距这里有约5华里，但每逢节庆都要来祭祀寨门。

大约300年前，阳烂寨只有龙姓几户人家，杨姓是后来从独坡乡搬来的，来到阳烂后，龙姓分给了一些田土山林，共同开了这个地方，据村寨的一块碑文记载、清嘉庆十五年时，阳烂村有龙、杨两姓41家，到1995年时，已发展到了146户790人。龙、杨两姓和睦相处，共同结寨繁衍至今。

接着杨老又给我们聊起了阳烂寨的“五行说”。东方甲乙木，祖先在寨子东边植有大片树林，作为寨

子的风景林，谁也不许砍伐。南方丙丁火，因此在村南边的溪上建桥时特别讲究，桥体绝对不能与南岸相连接，一旦相连，寨里的公鸡就会半夜起叫，寨子就有火灾降临，还在南边的山峦下挖了三个大坑，埋下三个大水缸，意为南方的火到此就熄了，火灾就进不到阳烂寨，以前所建的风雨桥如此。1986年一场洪水把风雨桥冲毁，村民又架起简易的独木桥，由于没有遵照老人的古训，独木桥连接了南北两岸，村里的公鸡就在半夜开叫，黄岩寨的公鸡也在半夜起叫了，寨中老人赶快把连接的独木桥拆开，才免了一场灾难。1987年，村民集资在建造钢筋水泥“同心桥”时，寨里的“太史”（读了古书的文化人）龙怀亮，根据“古训”，建桥没有与南岸相接，留有约20公分的空隙。西方庚辛金，在寨子的西边，有一座山叫剑山，好像一把利剑刺向阳烂寨，致使阳烂寨灾难不断，于是，祖先在建寨时于寨子的西头建了一座鼓楼，并把鼓楼朝西面的翘檐涂上红色，意为雄狮的大嘴，把剑山刺来的剑咬住，化险为夷。在寨子的西边还有一座虎山，祖先认为这虎山对村寨虎视眈眈，时刻会伤害阳烂的人畜，于是祖先便在鼓楼的西部安放了两墩石狮，若虎下山作恶，这两头雄狮便可制伏，保全寨子安全。北方壬癸水，祖先便在寨子的北面开了一条水渠，引水进寨。中方戊己土，祖先便在寨子中央拓一坪地，作为芦笙坪。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在阳烂寨得到很好的协调，阳烂寨两百多年来都一直平平安安，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这在侗族村寨史上是少有的。

阳烂寨的芦笙坪在寨子的中央，宽约100平方